

風雲激蕩

七十年

上

朱穆之◎著

FENGYUNJIDANG
QISHINIAN

五洲传播出版社

风云激荡七十年

朱穆之◎著
上

C53
ZMZ
V. 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云激荡七十年 / 朱穆之著.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85-1050-7

I. 风… II. 朱…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8457 号

责任编辑: 汤贺伟 初立忠

助理编辑: 沈晓雷 李 杰

设计制作: 缪 惟 张亨殷 刘豪亮

风云激荡七十年

(上、下)

朱穆之 著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 6 号华天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8

电话: 58891281

传真: 58891281

制版单位: 北京锦绣圣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60x240 16 开 印张: 47.75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85-1050-7 定价: 90.00 元(上下册)

作者介绍

朱穆之，1916年12月生，江苏省江阴县人。1936年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连任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35年，朱穆之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抗日爱国民主运动，是北大学生会三主席之一、北平东城区近20所大学游行队伍总领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朱穆之流亡南京办报。1938年进入华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至1942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先后担任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太行第六军分区政委，后又到地方做党的宣传、政治工作。

1946年以后直到1977年，朱穆之长期在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先后任解放区部主任、副总编辑、副社长、社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穆之被打倒受迫害，1972年复出，因同“四人帮”斗争，1976年春，再次被打倒。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朱穆之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之一。1978年，中央宣传部恢复后，朱穆之任副部长，主管部内日常工作。1982年至1986年，朱穆之任文化部部长。从1980年中央成立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起，至1992年底离休，朱穆之一直担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1991年4月至1992年底，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后，朱穆之任会长，2000年10月起，改任名誉会长。在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期间，朱穆之还是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顾问；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思想、宣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朱穆之并曾任第三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还曾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韩友好协会会长。

朱穆之曾出版《关于新闻工作》、《改革，才能开创文艺工作新局面》、《朱穆之论对外宣传》和《朱穆之论人权》等著作。



出版说明

一、朱穆之是我国新闻、宣传、文化界的老前辈，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宣传事业和人权研究工作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出版这本文集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朱穆之良好的思想作风和工作经验，以利于在新闻、宣传、文化界发扬优秀的传统。

二、朱穆之著述丰富，七十年来不下千篇。本书从收集到的300多篇文章、讲话中，精选出117篇，内容包括经历自述、论新闻工作、论对外宣传、论文化艺术、论人权研究与人权对外斗争以及政论、杂文和诗歌、散文等。其中，有一部分曾收入《论对外宣传》、《论人权》（内部发行）等书；一部分曾在报刊上登载，一部分系第一次发表。有一些已发表过的文章，这次作了适当的增删，有的改了标题或加了插题。

三、朱穆之经历丰富。他从一个追求进步的大学生逐步成为我国宣传思想战线领导人的过程，历经艰苦的磨炼和严峻的考验，具有启示作用。本书除收入朱穆之本人的经历自述之外，还刊载了5篇专文，以大量生动的事实，补充介绍朱穆之青少年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几段经历以及几起工作中的重要事件。

四、作为历史新时期对外宣传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朱穆之曾就对

外宣传工作发表过许多讲话和文章，全面论述了对外宣传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对外宣传工作的任务、意义和方针原则以及宣传艺术。本书选入关于对外宣传工作讲话和文章23篇。这是朱穆之从事宣传工作数十年的心血结晶，也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了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经验，并反映了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发展历程。

五、在我国，关于人权问题系统的研究和宣传，是从朱穆之1991年主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开始的。根据中央的指示，朱穆之主持起草了中国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以此为起点，他组织力量，启动了对人权理论及实践的系统研究和宣传工作。1993年，朱穆之创建中国人权研究会并任会长之后，他在人权的研究和宣传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本书选了28篇，从中可以了解中国对于人权的基本观点、人权建设的成就和问题、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

六、新华通讯社是朱穆之工作过37年的部门。他在参与领导和主持新华社工作期间，对新华社的建设、对新闻报道工作的规律，作过许多精辟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本书从中选了13篇。朱穆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过长篇“认罪书”，交代他执行“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罪行”。今日看来，他实际上执行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和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的新闻路线。对“认罪书”倒过来读，颇有意义，因此选入书中。朱穆之1946年写的《刘伯承将军纵谈战局》，是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名篇，也收进书内。

七、文化艺术事业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稳步进行。朱穆之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对文化艺术的改革作过大胆而细心的探索，为此发表过一系列讲话和文章，本书收进了其中13篇。在文化艺术改革正在深化的今天，重温朱穆之在文化工作

改革起步时的论述，仍是有益的。

八、朱穆之晚年从工作岗位退下后，仍应邀参加一些活动，撰写一些文章。他还抒写一些随感、随记和诗歌、散文。本书收进其中17篇。他早年写的几首诗也一并收入。

九、书中文章一般按写作和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有的为阅读方便起见，将内容相近的若干篇连在一起，未分时间先后。

十、本书可供广大读者特别是从事新闻、宣传、文化、外事工作的同志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和干部培训的辅助教材。

闪光的思想 非凡的经历

(代序)

曾建徽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口气读完朱穆之同志的《风云激荡七十年》。这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和指导意义的重要著作。它浓缩了一位毕生献身人民革命事业，为新中国新闻宣传文化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老前辈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和他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读后使我深为感动、深受启迪。

穆之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从青年时期起就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前后达半个多世纪。开始是在新华社，那是解放初期，他担任新华社副总编，我是刚参加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工作的一个20来岁的普通采编人员；“文化大革命”后，穆之同志担任中央宣传部管全盘工作的副部长兼新成立的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我以新华社副社长身份参加对外宣传小组，作为小组成员，1986年起兼任副组长，在穆之同志直接领导下辅助他做一些具体工作。穆之同志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高瞻远瞩、敏锐准确的洞察能力，坚持崇高理想、忠诚革命事业、忘我工作的精神，朴实谦和、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的

高风亮节，使我深受教益。可以说，我是在穆之同志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下成长起来的。他始终是我学习的楷模。

穆之同志十分谦逊，我们这些长期同他相处的部下，从未听他谈过自己的赫赫经历。如果不是五洲传播出版社这次出版这本书，他的一些不平凡的革命斗争事迹和丰富的新闻宣传工作经验恐怕会被湮没，那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走上革命大道

书中使我感触很深的是关于穆之同志一生丰富经历的介绍。它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党的指引下冲破长夜漫漫的旧社会，走上彩霞普照的革命大道，经过艰难曲折，成长为我国新闻宣传战线一位杰出领导人的闪光的人生历程。支撑着他的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他在散文《启明星》中，回忆战争年代夜行军中升起的启明星，把漆黑的夜比作旧社会，把共产主义理想比作启明星，它在漫长的夜行军中冉冉升起，突破沉沉的黑暗，照耀着夜行军到达目的地。那颗启明星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朱穆之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军阀混战连年，孩提时的朱穆之跟着父母在炮火中不断逃难，眼看着周围的人在极端贫困中挣扎、死去，自己的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31年，朱穆之到北平上高中，住在大姑父刘半农家。刘半农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他同情共产党，李大钊遇害后，墓志铭就是他写的。他对朱穆之有较大的影响。后来，朱穆之考入北京大学。北大学生很活跃，有许多进步社团。由于思想情绪相近，朱穆之经常和进步同学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一起。他涉猎了不少进步

书刊，还有一些进步影片。他说，这些都对他起了重要影响，要求革命的思想逐步萌发起来。当时侵占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华北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镇压共产党和要求抗日的进步人士，一些与他来往密切的同学也遭到逮捕，北平一片白色恐怖。朱穆之说，这种种的苦难和不平，很自然引起他的不满、苦闷和反抗情绪。

1935年，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下，眼看华北又将沦陷，无限悲愤的北平青年学生，在中共北平市党组织发动下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朱穆之作为新选出的北大学生会负责人，同学生会干部一起，组织北大同学参加了全市大中学生的示威游行。朱穆之是北大游行队伍的总领队，走在队伍最前面。途中一群警察用高压水枪拦住去路。朱穆之第一个冲上去，同几位同学一起夺下水枪，反过来对着警察喷射，警察狼狈奔逃，游行队伍乘势冲了过去。之后，更多的警察反扑过来，对游行学生大打出手。朱穆之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立即在全国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熊熊大火。谈到这段经历时，朱穆之说：“经过斗争的锻炼，受到党的教育，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1936年初，朱穆之在北大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大道。

在“一二·九”运动60周年和70周年的时候，朱穆之都应邀参加北大学子的纪念活动，并发表了语重心长颇富哲理的讲话。他说：“‘一二·九’时期，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甘冒生命危险，吃尽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而不后退，就在于有理想。这就是要抗日救亡，还要推翻旧社会，建立一个人人幸福的新社会。有了崇高理想，就有无畏的精神，无穷的力量。今后的中国就靠后来人了。作为对后来人的要求是什么呢？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建设‘四有新人’，‘四有’里面，理想为先。理

想有高低大小之分。这里所说的理想是崇高远大的理想，就是要有为国家、为人民、为世界的理想。只为个人，不顾国家、人民的理想是渺小的，没有前途的，称不上理想。只图个人有大把钞票，挥霍享受，这个理想就太小太低了。有人羡慕资本主义，这应该说是一个黑色的理想。资本主义社会决不是人类的理想。正因为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极度不满，才出现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我们的理想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而且要实现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共产主义。现在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多数人刚刚脱贫，还有许多人没有解决温饱，离共同富裕还有很大的距离。坚持我们的理想，就不会满足于现状，而会激励我们不断地奋斗，不断地前进。”朱穆之这一席谈话铿锵有力，深入浅出，切中要害，为今天广大的青年同志指出了方向。

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朱穆之流亡到南京，参加了根据党的指示接办的南京《金陵日报》的工作，负责写评论宣传抗日，还报道八路军作战情况。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构不许宣传抗日和民主，经常无理删改送审的社论、评论，朱穆之就用改头换面或干脆“开天窗”的办法坚持自己的主张。报纸受到读者欢迎，销路大增。这是他第一次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他从实际斗争中认识到新闻工作是抗日救亡工作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看到新闻工作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因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抗日根据地做宣传和统战工作

南京沦陷前夕《金陵日报》停刊，朱穆之流亡到武汉，他不愿再留在大后方，一心想到前线去，便利用机会到了敌后的鲁西北抗日根

据地聊城，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是1938年春。党组织派他做国民党旧军官石友三等的统战工作。

1939年元旦，朱穆之到河北南宫八路军129师向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汇报国民党石友三部情况，被两位领导留下来任师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那时他还不到23岁。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129师成立师政治部统战部，朱穆之改任统战部副部长（没有部长），对外名义是参议室主任。随即受师领导派遣，先后做过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24师和国民党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的统战工作。1941年春，师领导调朱穆之任平汉纵队秘书长，同时任太行第六军分区政委。1943年下半年，朱穆之被调往邓小平领导的北方局工作。1945年，他又受命作为八路军代表，先后两次赴敌占区新乡，做争取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将领的统战工作，这是需要很大的胆略和政治智慧的，而且要冒很大的危险。他做统战工作的一项重大成就，是在1945年10月蒋介石对解放区进攻发动的邯郸战役中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领全军一万余人起义。高树勋是第一个起义的蒋军高级将领，对随后的解放战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高树勋部随即改番号为民主建国军，邓小平要朱穆之担任该军政治部副主任，实际上是负责高军整个工作。朱穆之深知责任重大，一再坚辞，并提出自己还是做文字宣传工作比较合适。领导上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做宣传工作。这时，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新华社要求各大解放区设立特派记者。朱穆之被任命为新华社驻晋冀鲁豫解放区特派记者。他感到非常高兴，又能做他向往的新闻工作了。

朱穆之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后不久，刘邓大军取得郟城大捷，总社要求他采访刘伯承司令员。当时他在后方司令部，离前线很远，邓小平政委正在后方，要他在后方写，不必去前方。朱穆之向司令部参

谋处详细了解战况后，很快写出《刘伯承将军纵谈战局》一稿，经邓小平、薄一波同志审阅，得到他们的赞许，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名篇。当时解放军主动撤出张家口等一些城市，不少人对战争形势认识不清。朱穆之根据中央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以刘邓大军在晋冀鲁豫地区和鄆城大捷的事实，阐明“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的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稿件发出后，澄清了人们对战争形势的认识，受到多方的称赞，不但解放区各报在显著位置刊登，连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报纸也转载了。

为新华社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1947年，朱穆之正式调新华总社担任领导工作，直到1978年才离开。全国解放后，新华社从解放区通讯社建设成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和世界性通讯社的过程中，朱穆之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初，新华社由战争年代分散的宣传机关改变为国家通讯社，中央要求新华社成为全国的消息总汇，成为“精确地、及时地、系统地报道全国新情况，并通过这些报道推动工作、教育人民的最权威的消息发布机构”。新华社工作人员一时不能适应职能上的这一重大转变，特别是各地分社记者大多习惯于地方报道，不善于把国内国际总形势同自己的报道联系起来，文化水平和新闻写作水平也不高，写出的稿件采用率低；同时产生了许多思想问题，如“地方没有全国性新闻”、“短消息没意思”、“要短快多地发消息就不能深入，要深入就不能短快多”，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新华社能很好地履行国家通讯社的职能，朱穆之作为主管国内新闻报道的副总编辑，协助社主要领导做

了大量的业务思想工作，确立了一系列具有迫切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的新的业务思想和报道方针，包括树立全国观点、成为全国惟一的新闻总汇，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报道先进人物先进经验，国内国际和对内对外并重等。这些成为新华社带有根本性、原则性的工作方针，统一了全社的业务思想。

改进新闻写作，是新华社业务建设上的一个重大任务。为此，新华社由朱穆之主持在全社展开了练笔运动，像部队练兵一样，组织编辑记者学习和锻炼新闻写作，掌握各种新闻技术的基本功，使他们的业务素质、写作水平显著提高。全社上下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在组织上、业务思想上、工作上完成了重大的转变，很好地担负起了中央赋予的国家通讯社的职责。

更值得一说的是，朱穆之在业务思想上，对于人民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和业务思想工作，有许多精辟的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在当时许多讲话、报告和文章中指出，新闻报道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最根本的，是社会主义新闻报道和资产阶级新闻报道本质不同的所在。新闻记者思想意识要革命化：一要自觉地为革命而工作，这是根本，记者追求的不是名利、地位，而是革命。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服务。二要对革命负责，就是一切服从真理。记者天天反映情况，天天明辨是非，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就是只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铁面无私，对任何人不去吹吹拍拍，不掩饰什么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对的要敢于坚持，错的要敢于反对。只有做到了这两条，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记者，马克思主义的记者。新闻工作要起党联系人民的桥梁作用，把党的政策传达给人民，把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给党，帮助党了解真实的情况，制定真正符合人民意见和要求、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首先是要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因此，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和作用，就在于向党及时真实地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这就要求记者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的情况，是否正确，不仅要看到执行政策中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坏的一面；不仅要看到群众拥护的一面，也要看到群众怀疑甚至反对的一面；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事物，使党和人民能了解实际情况；如果政策有不完善、不切合实际、甚至错误的地方，领导机关就可以及时改正。在新闻报道中，朱穆之强调把真实列在第一条。他说，无产阶级的新闻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根本的区别在于：我们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讲真理，讲唯物论；资产阶级的一套则相反，他们是歪曲事实，从主观愿望出发，搞唯心论。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说朱穆之同志这些深刻论述，对今天的新闻工作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就在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实行改革开放，发展日新月异，如何及时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意见，帮助党制定和完善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并使之得到正确执行，这是新闻工作者第一位的任务。

1955年10月，毛主席提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他说，新华社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朱穆之说，他理解毛主席提出的就是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那时候新华社的国际消息几乎都依赖苏联塔斯社。从那时起，新华社开始了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新时期。朱穆之作为主管业务的第一副社长，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考虑，新华社不可能一下就建成世界性通讯社，要在可靠的基础上有步骤地进行，计划分两步走，首先在7年内建成以报道东方（亚非拉）为权威

的世界性通讯社，然后再逐步建成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与西方各大通讯社相匹敌的世界性通讯社。这是符合主客观实际的。西方大通讯社不重视亚非拉国家的报道，而且常作歪曲报道。这些国家一般也无力对外报道本国实际情况，中国能为它们作报道，替它们说话，并有利于它们相互沟通情况，将受到它们欢迎。因此，我们加强对亚非拉的报道，并以此为特色，成为报道东方国家新闻的权威通讯社，不仅在政治上有利于我国扩大国际影响，特别是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有利于与西方通讯社在新闻舆论领域争一席之地。自然也是与当时新华社的实际力量相符合。在报道方针上，改变过去对于国际情况常常只报道进步的对我有利的消息，其他一般不报道的做法，而要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世界发生的人们关心的重要情况，还要多发西方通讯社不愿播发的、对西方统治集团不利而对世界广大人民有利，以及能反映我国与西方不同观点的新闻与评论。作为世界性通讯社，需要在国外建立自己的记者网，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到1961年，新华社已在61个国家建立了分社或记者站，遍布亚非拉欧澳五大洲。新华社还在许多地区设立了出稿站，所发新闻受到亚非拉报纸的欢迎。为了培养驻外记者，新华社办了外语训练班，后来又与其他单位联合建立了第二外语学院。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设世界性通讯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一过程不久就被“文化大革命”所中断。

新华社同人民日报一样，在1966年5月上旬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朱穆之作为主持全盘工作的第一副社长首当其冲被拉下马，三天两头受到批斗。但是，他对党的信念并未动摇。被关“牛棚”的时候，他还写思想汇报进行抵制，说自己是正确的。造反派逼他写“认罪书”，交待“修正主义罪行”，他就罗列一系列事实作为“罪行”，实际上是要说明自己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比如，1957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批评